

CSSCI来源集刊

知识分子论丛

第 1 2 辑

许纪霖 刘 擎

/ 主编

现代中国的再阐释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现代中国”，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而是有待建构的一套想象。·许纪霖 /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王汎森 / 思想史研究经验谈·许章润 / 革命、文人与国家理理论纲·金观涛 / 论社会契约论的起源和演变·崇明 / 宽容与自由主义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CSSCI来源集刊

知识分子论丛

第 1 2 辑

许纪霖 刘 擎

/ 主编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现代中国的再阐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谓现代, 谁之中国? : 现代中国的再阐释 / 许纪霖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知识分子论丛. 第12辑)
ISBN 978-7-208-12439-4

I. ①何… II. ①许…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9650号

责任编辑 贾忠贤
封扉设计 储平
版式设计 赵晓韵



何谓现代, 谁之中国? ——现代中国的再阐释
许纪霖 刘擎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字数 223,000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439-4/D·2523

定价 36.00元

CSSCI来源集刊

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 主办

知识分子论丛编委会

主 编 许纪霖 刘 擎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列）

蔡英文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何包钢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
黄克武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李 强 北京大学政治系
刘 擎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齐慕实（Timothy Cheek）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
钱永祥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萧高彦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
应 奇 浙江大学哲学系
张旭东 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列）

陈宜中 崇 明 刘 擎 刘训练 罗 岗
钱永祥 王 利 许纪霖 应 奇 周 濂



世纪文景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

目 录

现代中国的再阐释

- 3 许纪霖：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 9 叶文心：重读西洋汉典：从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谈起
- 16 对 话：从民族到国家
- 22 刘 擎：批判语境主义视野下的现代中国
- 29 瞿 骏：在“古今交缠”中理解现代中国
- 34 对 话：从传统到现代

思想史研究的传统与方法

- 47 王汎森：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
- 64 王汎森 叶文心 齐慕实 许纪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

现场：革命、文人与国家理性

- 77 许章润：革命、文人与国家理性论纲：重读托克维尔
- 120 对 话：革命、立宪与国家理性

中国思想史研究

- 171 金观涛：论社会契约论的起源和演变
- 191 崇 明：宽容与自由主义
- 208 邓 军：“献身的热望”：以陈独秀的“宗教感”为主题的一项考察
- 241 高 波：民初代议制危机与贤人政治论的展开

西方思想选译

- 265 史蒂芬·P. 马尔克斯：从“匪夷所思的一纸宣言”到“六十亿人的‘十诫’”？
- 289 托马斯·班德：智识生活的文化：城市与专业

现代中国的再阐释

在全球的中国研究日趋碎片化、微观化的今天，有关中国研究的宏大叙事需求又重新浮现出来。以往中国研究的各种范式，从冲击—反应论、传统/现代二元论、帝国主义论到中国中心观，都面临各自的困境和挑战，那么，未来的中国研究是否需要新的范式？如何在全球现代性的视野中重新理解中国，“现代”与“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2013年6月25—26日，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院在上海联合举办了“现代中国的再阐释”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康奈尔大学、A&M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蒙特利尔大学，中国台湾“中研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学者们汇聚一堂，共同研讨什么是“现代中国”，如何理解“现代性”与“中国性”。与会者们从各自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对“现代中国”的新理解，并就现代与中国的系列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限于篇幅，这里选刊四位学者的主题发言以及相关讨论。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许纪霖

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个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空洞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我称之为“碎片化”的现象。也就是说，过去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趋于消解，大家的研究都在自己个别的微观领域来进行。今天中国的史学界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恰恰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在微观领域有很多突破，但是宏观背景却一片模糊。好比说，各自提供了一棵棵很好的树，甚至是一片很好的树叶，但对于那片森林，认识却是非常模糊的。每位学者都在自己的局部下棋，缺乏大局感和全局感。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一被认为是过于宏观和空疏的大问题，需要再次提出来引起我们的思考。任何一个微观的研究，都要借助某种宏观的知识背景，即使不研究宏观问题，也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某一个或几个理论预设或者框架背景；而任何一个微观领域的研究，其真正的意义也只能放在宏观的知识背景里面才能获得理解。

中国研究的四种模式

关于“什么是现代中国”，过去存在着四种不同模式的理解。第一个模式首先是费正清提出来的冲击—反应论，把现代中国理解为由西方

的冲击而产生的回应。第二个是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模式，这个模式到今天还有巨大的影响，甚至某种意义上在大陆史学界还是主流，把现代中国看成是怎么克服传统、走向普遍的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第三种模式，柯文把它概括为帝国主义论，在中国史学界过去更多地体现为革命高潮论，把现代中国的历史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革命，最后取得胜利的历史。第四个可以称之为中国中心观，这是柯文最早提出来的，试图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框架，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出发来理解现代中国；在日本和韩国，不少学者也试图超越西方的视野，提出东亚现代性，认为东亚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同欧洲完全不一样，有自身的脉络和历史渊源。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是 1840 年以后的事，而是从宋代以后就有一个缓慢的、自身演变的过程。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史学界也出现了中国（历史）特殊论的观点，而且开始逐渐变得主流。

虽然现在许多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拒绝谈宏观问题，但谈也好，不谈也好，它总是在那里，只是你不自觉而已。所以，我认为对“何谓现代中国”需要反思，从而获得一个“背景性的自觉”，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微观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对已有的四种模式进行反思。对现代中国的阐述，不是重新开天辟地另搞一套，而是从原有的四种模式再出发，再阐释。

谁之中国？

我们先来看什么叫中国。过去关于研究中国的各种模式里面，中国似乎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但是在今天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里，一个整体的中国似乎已经消解了，似乎难以言说。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有各自不同的中国想象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史学界，这二十年来出现一个潮流，

就是政治、外交、思想史的衰落和社会文化史的兴起。政治、外交和思想史是在国家的整体层面作研究，所以它有一个整体中国的想象；这些年由于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整个研究的眼光下移，开始从那些长时段的社会文化来思考和研究中国。所以，区域史的崛起、城市史的崛起，开始把某个城市、若干的区域，乃至某个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对象。这种趋势出现以后，伴随出现的问题是整体中国的消解。中国今天已经被撕裂成为一个个区域性的中国、局部性的中国。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当然离不开对局部的、碎片化中国的理解，但是，部分相加的总和并非意味着整体，整体的中国并不是部分的相加，哪怕把岭南、江南、巴蜀、齐鲁、陕北、东北……这些区域的研究全部加起来，也并不意味着获得了对整体中国的理解。今天中国史学界的问题，在于局部中国的图案越来越清晰，但在局部清晰的背景里，整体的中国却显得模糊起来。经过了理解区域中国的积累以后，整体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如何在区域中国、城市中国的基础上，获得对于整体中国的深层次理解？这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即使各种理解是竞争性的、多元的，也仍是必需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再反过来深化对区域中国的研究。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何为“中华民族”。现代中国继承了清代的遗产，它的内涵不仅是汉民族的历史，也不仅是汉民族所生活的区域，它还包括满、藏、回、蒙等其他各族。我们今天对中国的理解大都是汉人历史视野中的中国，缺乏少数民族的视野。这些年，由于新清史提出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理解中国的主体视野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我们要重新理解一个多民族视野下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现代中国建立的是 nation-state，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但是从它的存在形态来说，就像白鲁恂所说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国家伪装下的文明国家。中国这么大一个版图事实上的确是以帝国的方式存在的，而不是一个典型的 nation-state，即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事实上，不同

的民族视野下所看出来的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原与边疆的视野就有很大的差别。民族视野里面看出来的中国和我们过去以中原视野看出来的中国有什么区别？显然这也包含在我们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的问题之中，进而言之，什么是“中华民族”，这个 nation 是什么？这同样是这些年提出的一个挑战，值得我们思考。所以说“中国是什么”，这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它是有待建构的一套想象。

何谓现代？

何谓现代性？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模式，或西方现代化的模式里，所谓“现代”就是以西方为代表的价值和制度设置，甚至是可以量化的一套现代化物化指标。但这几十年，这样的理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出现了多元现代性的趋势。多元的现代性出现之后，是否消解了现代性的普遍性呢？或者说，现代性不再以某种普遍的方式存在，而只是相互之间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的各种特殊的现代性？

如果说各种现代性都只是特殊存在的话，那么现代性本身就已经去普遍化了，它本身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提出这个问题，乃是要思考，所谓现代中国中的“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而言，“现代”究竟是普世的，还是特殊的？或者是特殊之中蕴含着普世的性质？

我们之所以走不出普遍与特殊对立的怪圈，乃是由于过去我们是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来思考和理解“现代”的普遍性。我这几年的工作乃是试图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的方法来重新理解“现代”的普遍性。就像亨廷顿所说的，所谓的普世文明，并非以西方为代表，而是各种不同的现代文明当中共享的那部分，也就是说，“现代”的普遍性存在于各种特殊的现代性当中，而共享的那部分是普世的，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的方式存在。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理

解，现代中国所呈现的现代性不是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一方面它具有某些“家族类似”的特征，具有现代性的大部分特征，但另一方面，中国依然有自己的特殊性。所谓特殊性，就是在现代性的各种价值和元素之中，将富强这一价值作为优先的选择，而将另外一些价值，比如说自由、民主和法治作为次要的选择。

现代性与中国性这两者之间，我们应如何理解？过去我们总是把现代性视为普遍的，中国是特殊的。现在讲中国特色的什么什么，实际上也是把某个东西看成是普遍的，而中国只是普遍当中的某个特殊而已。当我们以家族类似的方式重新理解现代性之后，普遍与特殊、现代与中国就不是被放在对立的、二元的位置，而是可说所谓的“现代中国”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现代中国一百七十多年的现代化历史，既是中国特殊的道路，同时又提供了某些现代性的普遍经验，又因为一度以所谓的特殊性对抗普遍性，走过弯路。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既符合普世文明的那些“家族类似”价值，又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

现代中国知识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

实际上，何谓现代中国并不是一个事实性的揭秘，而是一个知识性的解读。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事实的争论，就好像现代中国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要去认识它、揭示它的真相。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现代中国”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不仅与认知有关，而且需要解读和想象，是主观和客观相互交错在一起的知识，是各种各样竞争性的话语，或者知识类型。前面所说的四种现代中国研究模式就是如此。我们要思考的是：它们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里面，我们如何来生产和再生产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

过去有关现代中国的知识叙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知识话语的影响，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几年东亚现代性、国学兴起之后，他们试图生产一套与西方知识谱系不一样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纯粹的现代中国知识是否可能？如果可以，它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谱系之上？能够续接在传统国学的知识谱系上吗？显然，这很困难，正如张灏教授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在从“戊戌”到“五四”的世纪之交的转型时代，中国的文化范式和知识话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型，这个转型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在今天，所谓的现代中国的知识话语已经是古今中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再提炼出一套所谓纯粹的中国话语。

何谓现代中国，有这么多复杂的、互相纠缠的问题值得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我，我现在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讨论，从不同的视野里聚焦，从而形成初步的看法。

许纪霖 /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重读西洋汉典：从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谈起

叶文心

纪霖老师的发言中谈到知识谱系，同时谈到在知识谱系问题上我们如何运作在几个不自觉的大传统之中。他也谈到中国近代思想体系所承受的西方或者欧美文明因素。中国接受西学、追求现代化，曾经是在晚清以来追求富强的大前提之下逐步开展的。纪霖老师方才提出，如果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富强地位已经不成为问题，如果以富强为指标的“现代”对中国来说已经算是或多或少地在握，如果救亡图存已经不是今天中国知识人焦虑的重点，那么我们现在思考中国所体现的现代性，是否可以在知识上作一些新的体认或评估？如果我们谈的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知识问题，尤其是大家现在所关心的中国模式的特殊性或普遍性问题，我们如何把一个世纪以来有关“现代”、“中国”、“特殊”、“普遍”几个大的概念作一个梳理，尤其是透过对知识谱系的厘清，让我们今天在谈这些大问题的时候，不至于流于空泛，也不至于不知不觉地掉在大传统之中，以致复制了过去历史语境中的过时产品？

回应纪霖老师的发言，我想提供的是有关今天英语汉学界对中国知识生产尤其是中国现代性问题所进行的一些反思。我们六七个人近两年来有个读书小组，不定期聚会，随性之所至，以及各人在不同时候各

自的便利，大家彼此一面相互敦促，一面相互协力，把列文森教授的大作《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作了一个初步的重读。以下就是我的相关报告。

为什么重读？

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完成于 20 世纪中期的五六十年代。当时的中国与美国处于相互敌对、相互闭锁的状态。美方学院里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建制，延续了“二战”期间的建构，跟联邦政府的国策、国家安全机制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研究的内涵虽然兼顾古今文史社会，但是并不纳入大学里一般人文以及社会学科的主流，而是另树一帜，形成以汉语训练为基础的区域学门。当时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大师，除了列文森以外，便是与他一同出身哈佛的史华慈。两人都有深厚的欧洲思想史背景，都有犹太渊源，史华慈研究严复，列文森研究梁启超，不约而同，都把中西文化交通以及知识转型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不约而同，两人也都把 1949 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的终结段落，解释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共的建国成为理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展的最重要命题。

我们今天重读北美学院派的汉学经典，不能不把一些学术上的内缘以及外缘变化考虑在内。中国跟美国在建交三十年之后，成为战略性伙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敌对”不足以描述双方多面向的关系，相互闭锁更成为过去。中国学在美国持续发展，引介了大量来自中国的人才。任何西方汉学者在接受培养的过程之中，都不可能不在中国进行相

*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中译本译为《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编者注（若非特别标注，下文星号注均为编者注，不再一一注明）

当时段的学习与交流。西洋汉学的著作，所面向的不但是英语世界的读者群，同时也包括中国的同行与同好。今天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比起半个世纪之前，产生了许多变化。这个变化总体来说，是走向双语化，英汉并用；走向国际化，同时面向国内以及国外的知识群体；走向知识化，从学术的角度对公众进行中国教育。北美的中国学以往曾经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部门，现在则更多的是通过知识的建构以及议论的发挥，形塑公民社会中的中国形象以及中国话题指向。

列文森的大作有它的时代创作背景，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列文森作为一代思想史大师，他的文本有长远开创性的影响力，也有当年学术环境中的盲点。我们今天重读列文森，可以有些什么样的取径？我们在今天能够对他的作品开发出什么样的生命力？

我们几个人基于以上的命题意识，从2011年以来，进行了几场小型与大型、闭门与开门的读书与讨论。2013年3月在亚洲学会年会期间，由齐慕实（Timothy Cheek）组织，更展开了一个“研读列文森”的小组发表会，到会者除了思想史、学术文化史的同行以外，还包括了列文森当年的门生以及同事，形成了座无虚席、人满为患的场面。

如何重读？

2013年亚洲学会的那场讨论，我们“读书小组”的成员提出了三个报告，由我作点评。齐慕实因病缺席，所以我们谈了晚清民国，谈了新清史、鲁迅以及当代，但是独缺对毛泽东时代的讨论。这三篇报告大致说来，展现了以下几个不同的阅读战略。

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从列文森到今天，北美以及西方学界积累了更多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文献档案。列文森在许多命题上提出大问题，但是没有细致的答案。我们今天重读列文森的第二个战略，就是在他所